

《大云经疏》初步研究

林世田

一、引言

现存《大云经》有两种：北凉昙无讖译《大方等无想经》、姚秦竺佛念译《大云无想经》（仅存卷九），《大云经疏》则仅见于敦煌文献 S2658、S6502 两个抄本。

《大云经》之所以被历史学家重视，自然是由于此经与武则天篡唐称帝有关。自从敦煌发现《大云经疏》之后，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如罗福苣、王国维、陈寅恪、狩野直喜、汤用彤、萧登福等人都对此有所研究，尤其是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和意大利学者 Antonino Forte 更有长篇论文和专著加以研讨。缘自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都记载《大云经》乃是薛怀义、法明等僧人伪造，说明武后为弥勒菩萨下生，当王国土，以此献媚武后，武后果然心喜，敕命天下大造大云经寺，以藏《大云经》云云。学者遂据此认为武后登基称帝，是以《大云经》作为女皇临御天下的意识形态而大造舆论，愚弄黎民百姓。

然而史书众口一辞都说是伪造《大云经》，或者是新译《大云经》。在敦煌出土《大云经疏》以前，学者对此深信不疑。但也看出诸家说法不一，例如：是伪造《大云经》还是重译《大云经》，作伪者是十人还是九人，等等。

现存佛经中多有伪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大云经》早在北凉时代就有译本，且见于隋唐经录，注明译经僧就是竺佛念、昙无讖。单从《大云经》经文涉及女身当王国土不过寥寥数语，实不足以单独作为武则天篡唐称帝的有力根据，况且武后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便自称受命于《大云》之偈、《宝雨》之文。已有学者注意到“《宝雨》之文”即指《宝雨经》而言，不过没有看出武后为什么看重“《宝雨》之文”的真实思想，或者没有着重指出武后以女身称帝，是缘于《大云经》和《宝雨经》都托言佛尊授记。因此，她武则天以女身称帝乃是受命于佛，而不同于往昔男身称帝是受命于天。试取两经有关段落加以比较：

《大云经》卷4：

尔时，佛告天女：“且待须臾，我今先当说汝因缘。”是时，天女闻是说已，即生惭愧，低头伏地。佛即赞言：“善哉！善哉！夫惭愧者，即是众生善法衣服。天女！时王夫人即汝身是。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优婆夷，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受持五戒，守护正法，摧伏外道诸邪异见。汝于尔时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①

《宝雨经》卷1：

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曰月光，乘五身云来诣佛所，右绕三匝，顶礼佛足，退坐一面，佛告天曰：“汝之光明甚为希有。天子！汝于过去无量佛所，曾以种种香花珍宝、严身之物、衣服、卧具、饮食、汤药恭敬供养，种诸善根。天子！由汝曾种无量善根因缘，今得如是光明照耀。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

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治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于一切时常修梵行，名曰月净光。天子！然一切女人身有五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作转轮圣王，二者帝释，三者大梵天王，四者阿鞞跋致菩萨，五者如来。天子！然汝于五位之中当得二位，所谓阿鞞跋致及轮王位。天子！此为最初瑞相。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当彼之时，于此伽耶山北亦有出现。天子！汝复有无量百千异瑞，我今略说，而彼国土安隐丰乐，人民炽盛，甚可爱乐，汝应正念，施诸无畏。天子！汝于彼时住寿无量，后当往诣睹史多天宫，供养承事慈氏菩萨，乃至慈氏成佛之时，复当与汝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②

可见《宝雨经》说得更具体，挑明当在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一般理解为中国）为帝，而《大云经》只是含糊说净光天女当王阎浮提，这便是为什么武后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自称“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宸披祥，《宝雨》之文后及”^③的基本思想。

新旧《唐书》等史料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宝雨经》，仅仅记述沙门造作《大云经》以献媚于武后，不能不说是当代史家失察。

从《大云经》和《宝雨经》的经文看来，要说完全是伪作则不可能，但是前引有关净光天女和月光天子以女身当王阎浮提、摩诃支那的段落，可能是当年亲近武后的僧侣所加！或者说是他们利用了两经的有关段落献媚于武后以劝进。这是因为考虑到史书记载武后好符命，而从《大云经疏》的内容看来，恰恰是大量引用了图讖之说，以投其所好。因此，新旧《唐书》等所说伪造《大云经》当为伪造《大云经疏》之误。矢吹庆辉就曾指出：《大云经》下当补一“疏”字。此前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中国学者王国维便称之为《大云经疏》，矢吹庆辉更进一步称为《武后登极讖

疏》。中外学者如此称呼，当是根据日本一部 1094 年编撰的《东域传灯录》内有《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一卷，汤用彤即用此称呼。

如果上述判断不误，就必须进一步探讨《大云经疏》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作于什么年代？本文即就此迄无定论的问题试加考证。

二、《大云经疏》撰人考

《大云经疏》所引图讖，都有名称，但有几处仅有“义曰”，前人不察，误“义”字为“意义”，实则《大云经疏》所谓“义曰”，透露了《大云经疏》的主撰人就是武后也自承认的男宠薛怀义。

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记载：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惠）稜、行感、德感、知静、（玄）轨、宣政（《旧唐书》中华书局本误断为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廐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颇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勳屡以法劾之，怀义遇勳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又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建殿宇，改名佛授记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闕，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三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永昌中，突厥默啜犯边，以怀义为清平道

大总管，率军击之，至单于台，刻石记功而还。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赐帛二千段。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④。

传中明言薛怀义曾与法明等造《大云经》，而又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而前面提到薛怀义、法明、处一、惠俨、（惠）稜、行感、德感、知静、（玄）轨、宣政等人在内道场念诵，由此可推断《旧唐书》作者认为他们便是《大云经》的作者。不过，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的记载，与前述薛怀义因公封梁国公、鄂国公相矛盾。

《旧唐书》卷六记载：载初元年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⑤

《新唐书》卷七十六记载：“拜薛怀义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令与群浮屠作《大云经》，言神皇受命事。”^⑥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载初元年七月明载：“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⑦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又载：天授元年十月“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⑧按：此撰疏僧云宣或为下文《长安志》所记大云经寺沙门宣政的省称。

《长安志》十记载：“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⑨

《僧史略》下：“案《唐书》则天朝有僧法朗等重译《大云

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为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由之革命称周（新《大云经》曰：终后生弥勒宫不言则天是弥勒），法朗、薛怀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高座讲说。赐紫自此始也。”赞宁接着评论说：“观《新唐书》言《大云》是伪经则非也，此经晋朝已译，旧本便云女王，于时岂有天后耶！盖因重译故有厚诬，加以挟薛怀义在其间，致招讥诮也。”^⑩

《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载初元年敕沙门法朗九人重译《大云经》，并封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赐紫始此）。”^⑪

《隆兴编年通论》卷十四：“弘道元年……明年七月，沙门十辈诣阙上《大云经》，盛称则天当即宸极，则天大悦，赐十沙门紫方袍、银龟袋，颁经于天下郡国，各建大云寺。九月，则天革唐命，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论曰：新唐史极恶《大云》之妄，然其后菩提流志、不空三藏、清凉国师诸公皆未有考其所以来而黜绝之。今是经犹列于藏中，迹其真妄固未易详也。则天革命当太宗时已著秘谶，安在临朝称制而献《大云经》哉！是十沙门者以律按之，其显异之罪自当摈斥，不得列于僧数，则天欲遂己之私而宠贵之，是不独革唐命抑亦兼坏释氏法矣，悲夫！”^⑫

综合上列史料看来，除皆断言《大云经》为众沙门撰造或重译外，对于撰译人员则诸说不一。这个问题因史料阙如，实难确指，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那就是史书所言诸撰疏僧曾受封为县公。所幸《大正新修大藏经》中《佛说宝雨经》及敦煌出土《佛说宝雨经》写本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可能的答案。《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卷二后附译场组织人员名单如下：

大周长寿二年岁次癸巳九月丁亥（据敦煌写卷 S2278 当补一“朔”字）三月（据敦煌写卷 S2278 “月”当为“日”）己丑佛授记寺译

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

南印度沙门摩流支宣释梵本
中印度王使沙门梵摩兼宣梵本
京济法寺沙门战陀译语
佛授记寺沙门慧智证译语
佛授记寺沙门道昌证梵文
天官寺沙门摩难陀证梵文
大周东寺都维那清源县开国公沙门处一笔受
佛授记寺都维那昌平县开国公沙门德感笔受
佛授记寺沙门思玄缀文
长寿寺主沙门智澈缀文
佛授记寺都维那赞皇县开国公沙门知静证议
佛授记寺主渤海县开国公沙门行感证议
大周东寺都维那章县开国公沙门惠俨证议
天官寺上座沙门知道证议
大周东寺上座江陵县开国公沙门法明证议
长寿寺上座沙门知机证议
大奉光寺上座当阳县开国公沙门惠稜证议
佛授记寺沙门神英证议
京西明寺沙门圆测证议
波罗门僧般若证译
波罗门僧臣度破具写梵本
鸿州度山县人臣叱干智藏写梵本
婆罗门臣迦叶乌担写梵本
婆罗门臣刹利乌台写梵本
尚方监匠臣李审恭装
麟台楷书令史臣杜大宾写
专当典并写麟台楷书书令史臣徐元处
专当使文林郎守左术翊二府兵曹参军事臣傅守真

敕检校翻经使典司宾寺府史赵思泰

敕检校翻经使司宾寺录事掇然孙承辟^③

从上列名单可以看出，其中除薛怀义作为监译名列首位之外，另有七位沙门有县公头衔。他们是大周东寺都维那清源县开国公沙门处一、佛授记寺都维那昌平县开国公沙门德感、佛授记寺都维那赞皇县开国公沙门知静、佛授记寺主渤海县开国公沙门行感、大周东寺都维那章县开国公沙门惠俨、大周东寺上座江陵县开国公沙门法明、大奉光寺上座当阳县开国公沙门惠稜。这份名单除缺玄轨和宣政以外，余者与《旧唐书》卷一八三所载吻合。不过薛怀义不是县公，此前他已是位显权重的辅国大将军、鄂国公，因此，可以肯定这九位县公就是薛怀义网罗在一起撰造《大云经疏》的作者，因此作者包括薛怀义在内应为十人，而不是九人。从《宋高僧传》中，也可以查到其中几位县公的简历，只是宣政其人不见于僧传等史料。

法明，据《宋高僧传》本传：本荆楚人也，博通经论，外善群书，辩给如流，戒范坚正。中宗神龙元年入长安，适遇中宗诏僧道定夺《老子化佛经》真伪，法明问道士：老子化胡成佛，老子为作汉语化？为作胡语化？若汉语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语化，此经到此土便需翻译，不知此经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诵胡语、何人笔受？道士无法回答^④。据《宋高僧传·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武则天天授年间与慧俨等曾预天智译场，担任《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的证义^⑤。

处一，据《宋高僧传·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武则天天授年间曾预天智译场，担任《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的笔受。

惠俨，据《宋高僧传·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武则天天授年间曾预天智译场，担任《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的证义。

德感，据《宋高僧传·唐洛京佛授记寺德感传》，俗姓侯，太原人。仪容环丽，学业精瞻，众典服勤，于瑜伽论特振声彩，天皇大帝征为翻经大德，因功封昌平县开国公^⑮。据《宋高僧传·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曾预义净译场担任证义^⑯。据《宋高僧传·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武则天天授年间曾预天智译场，担任《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的证义。

玄轨，据《宋高僧传·唐洛京大遍空实叉难陀传》，曾参加实叉难陀在京师清禅寺及东都佛授记寺的译场，译《文殊授记》等经，前后总出一十九部，玄轨担任笔受^⑰。

法朗，《僧史略》转述《旧唐书》有谓法朗等重译《大云经》，恐是将法明误作法朗，不过，法朗也确有其人，据《宋高僧传·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姑苏人，诵观音神咒颇有神验，曾治愈城阳公主顽疾，赏赐丰厚，并未提及他参与炮制《大云经疏》^⑱。

从上述历史记载混乱，可以断定盛行于武周的《大云经疏》早在五代之前已经佚失，造成后代史学家将薛怀义等编撰的《大云经疏》与竺佛念、昙无讖各自所译的《大云经》混为一谈。原因可能为二：一是《大云经疏》粗制滥造、水平低劣。二是政治因素，中宗复唐，为武则天登基造舆论的《大云经疏》，自然被毁。

宋代祖琇说得好：“新唐史极恶《大云》之妄，然其后菩提流志、不空三藏、清凉国师诸公皆未有考其所以来而黜绝之。今是经犹列于藏中，迹其真妄固未易详也。则天革命当太宗时已著秘讖，安在临朝称制而献《大云经》哉！是十沙门者以律按之，其显异之罪自当摈斥，不得列于僧数，则天欲遂己之私而宠贵之，是不独革唐命抑亦兼坏释氏法矣，悲夫！”这位高僧不但怀疑献《大云经》说，而且认为武则天遂己之私，而宠贵献媚的御用沙门，不但应按其罪而开除僧籍，尤有甚者，武氏私宠之更是兼坏释氏之法！此论别有见地，可谓精当！

三、《大云经疏》撰作年代考

《大云经疏》中涉及的年代见于下列诸条：

自文明已迄四岁，凡五年也。欲见不见，岁在戊子也。

睿宗文明元年即 684 年，武后临朝称制改元光宅（684，甲申），文明后 4 年即戊子（688），甲申至戊子正好五年。岁在戊子即垂拱四年（688）。

今神皇临驭天下，频得舍利，前开祥于光宅，今表应于载初，故《广武铭》云：“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者，即明神皇先发弘愿，造八百四万舍利宝塔，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于四天下，此则显八表一时，下舍利之应，斯乃不假人力所建，并是八表神功共成，此即显护持正法，大得舍利之验也。这里提到光宅和载初（689～690）年号。

羲农未获之瑞，屡呈垂拱之年；轩昊不记之祥，频应载初之日。这里提到垂拱（685～688）和载初年号。

从载初是《大云经疏》中出现的最晚年号看来，其撰作年代下限应在载初年间，这与正史记载是相符的。

又讖云：今岁会癸酉，强贼悉皆休，天下得安宁，万人不怀愁，触地生五谷，不烦牛与耒。谨按：来年正月一日癸酉朔，即是今岁会癸酉也。自裴兼、李敞等谋反，拟取西京，今并自相告言，皆伏其罪，中外宁谧，故曰强贼悉皆休。今兹五谷丰稔，特异常年，自古禾菽丰盈，例多偏并，或东饥西熟，或北少南丰，未有如今年率土余粮，普天皆熟，岂不以明年是癸酉之年，正与讖文符会。

所谓“岂不以明年是癸酉之年，正与讖文符会”之癸酉年，应是高宗咸亨四年，即 673 年，则今年应是指咸亨三年，即 672 年。但是从所谓“来年正月一日癸酉朔”看来，应指天授二年（691）而言，因为此年正月一日正是“癸酉朔”，其前一年则为载初元年

(690)。

从上可以看出，《大云经疏》撰作年代：上限为垂拱四年，下限为载初元年（690）。若以上限为撰作年代，下文中提到载初年号不可解，更何况《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载初元年七月明载：“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四卷，表上，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若以载初为撰作年代，则与年代上限太不协调。比较合理的推断是，《大云经疏》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图讖部分，早在垂拱四年已着手收集或撰写，后经多人（十个僧人）、多次补充，最终在载初年间定稿，并且送给了武后过目，这样，武后称帝之前的两个月就能胸有成竹地下诏颁布于天下。

汤用彤先生认为《大云经疏》作于天授元年（690）。Antonino Forte 认定《大云经疏》作于 689 年 12 月 18 日至 690 年 10 月 15 日之间，此说符合载初元年之证。武则天改国号称帝，乃在此年九月壬午，即九月初九日，相当于公历 10 月 6 日，很显然撰定并上呈《大云经疏》不可能在武则天称帝前一天，而应在此前几个月。Forte 能够运用陈氏朔闰表，推算改元载初之日期和武则天改国号称帝的日期，实属难能可贵。

四、结束语

本文从《大云经疏》撰作人员、撰作年代等方面，对《大云经疏》粗加探讨，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大云经》并非薛怀义等所造或重译，两《唐书》等记载薛怀义等造《大云经》实为造《大云经疏》之误。司马光就曾指出，九人被封为县公者乃是撰疏僧，不是造《大云经》的和尚！不过薛怀义不是县公，此前他已是位显权重的辅国大将军、鄂国公，因此作者包括薛怀义在内应为十人，而不是九人，他们是薛怀义、法明、处一、惠俨、惠稜、行感、德感、知静、玄轨、宣政。《大云经疏》之作，实是武则天授

命薛怀义等所炮制，目的是为武则天以女身君临天下制造舆论，使她具有“受命于佛”的“合法身份”。《大云经疏》，特别是图讖部分，早在垂拱四年（688）已着手收集或撰写，后经多人（十个僧人）、多次补充，最终在载初年间定稿。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就教于净定老居士、荣新江教授、邓文宽研究员，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岩波书店，1927年6月。
2. 王国维：《唐写本大云经跋》，《观堂集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6月。
3.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
4.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8月。
5. 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 1976。
6. 《大云经疏》をめぐって，《敦煌と中国佛教》，大东出版社，1984年12月。
7. 萧登福：《敦煌俗文学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
8. 萧登福：《讖纬与道教》，文津出版社，2000年6月。
9. 王涤武：《武则天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
10. 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11. 荣新江：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民大史学》第一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

注：

-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12册 P1097c~1098a。
-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16册 P284b~c。
-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10册 P1a。
- ④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中华书局标点本，P4741~4742。
- ⑤ 《旧唐书》卷六，中华书局标点本，P121。

- ⑥《新唐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标点本，P3481。
- ⑦《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标点本，P6466。
- ⑧《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标点本，P6469。
- ⑨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119。
- ⑩《续藏经》150册，新文丰影印本，P315。
- ⑪《大正新修大藏经》49册 P369c。
- ⑫《续藏经》130册，新文丰影印本，P559。
- ⑬《大正新修大藏经》16册 P292a~b。敦煌本 S2278《佛说宝雨经》卷九末也附有译场人员名单，但略有不同。
- ⑭《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813b~c。
- ⑮《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19b。
- ⑯《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31c。
- ⑰《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10b。
- ⑱《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719a。
- ⑲《大正新修大藏经》50册 P863b。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上接第43页）

- ⑤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八，《春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 ⑥按，服虔《汉议驳》，《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称南朝梁阮孝绪作《七录》时尚存，唐初已佚。
- ⑦郑玄：《驳何氏汉议》，《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驳何氏汉议叙》，《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均已失佚。
- ⑧参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0页。
- ⑨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礼记义》十卷”，注云：“何氏撰”，不知是否系何休的著作，待考。
- ⑩〔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注引王嘉《拾遗记》。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